Marco Polo and

the Silk Road

(10th–14th Century)

马可·波罗与10—14世纪的丝绸之路

荣新江 党宝海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学术丛刊 乙编 第五种

丛刊编委会

主编：袁行霈

编委（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名）：

程郁缀　傅　刚　刘玉才　潘建国

齐东方　荣新江　沈乃文　王　博

徐　俊　袁行霈　张志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可·波罗与10—14世纪的丝绸之路/荣新江,党宝海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6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学术丛刊)

ISBN 978-7-301-30328-3

Ⅰ.①马… Ⅱ.①荣… ②党… Ⅲ.①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人物研究—文集 ②丝绸之路—文集 Ⅳ.①K835.465.89-53 ②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4355号

书　　名	马可·波罗与10—14世纪的丝绸之路 MAKE·BOLUO YU 10—14 SHIJI DE SICHOUZHILU
著作责任者	荣新江　党宝海　主编
责任编辑	张　晗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328-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67315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26.25印张　455千字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　录

序 …… 袁行霈 / 1

马可·波罗研究

关于中国的片段:*Devisement dou monde*的*f*抄本 …… 孔　秦 / 3
卡塔兰地图(1375)中的马可·波罗 …… 朴贤熙 / 21
在文本与历史之间:马可·波罗对卢沟桥的描述 …… 安德烈欧塞 / 48
元代杭州的桥
——从马可·波罗的记述说起 …… 王一丹 / 67
马可·波罗所记元朝洒马奶之祭
——兼论马可·波罗在元上都的时间 …… 马晓林 / 84
"行在"卖卜的城市经济
——从《马可波罗行纪》中的杭州"星者"谈起 …… 周思成 / 94
元代军事史上被忽略的一章:蒙古哨马研究 …… 曹金成 / 104
《马可·波罗寰宇记》所载几则人名称谓补证 …… 罗　玮/116

丝绸之路研究

香料与东西海上之路论稿 …… 高荣盛 / 131
木头沟的摩尼教—佛教寺院
——丝绸之路遗址数据库的建立与遗址核对的深化
…… 西村阳子　北本朝展　张　勇 / 172
敦煌文献所见公元10世纪的丝绸之路 …… 荣新江 / 190
10—14世纪塔里木盆地南道的村镇聚落与道路交通 …… 罗　帅 / 206

宋元之间哈密地区独立政权的出现
——从马可·波罗对哈密州的记载说起 …… 付 马 / 224
马可·波罗时代的印度洋贸易 …… 林梅村 / 233
元朝与伊利汗国的海路联系 …… 党宝海 / 248
忽鲁模思古代港口探源
——马可·波罗与忽鲁模思 …… 穆罕默德·博格尔·乌苏吉 / 264
伊利汗国的珍珠文化史 …… 马昙雅 / 278

中外关系史研究

元代陶事两题 …… 尚 刚 / 291
西来“设睹噜”法
——占星术中祈福禳灾的秘密空间 …… 孟嗣徽 / 299
《库什王纪》所载B.sīlā与东亚古国新罗 …… 刘英军 / 322
“蒙古和平”时期的中国和伊朗:伊利汗国翻译计划中叙利亚派基督徒的
隐晦参与 …… 谏早庸一 / 341
合赞双城的崛起
——史料中的帖必力思与合赞尼牙 …… 陈 溯 / 363
14世纪晚期至15世纪波斯宫廷收藏的道释画 …… 俞雨森 / 383

“马可·波罗与10—14世纪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 罗 帅 / 405

Content

Foreword ····· Yuan Xingpei / 1

Study of Marco Polo

Fragments of China: the *f* manuscript of Marco Polo's *Devisement dou monde* ····· Chiara Concina / 3

Marco Polo in the Catalan Atlas (1375) ····· Hyunhee Park / 21

Between Text and History: Marco Polo's Description of the Lugou Qiao (卢沟桥) ····· Alvise Andreose / 48

Bridges in Hangzhou of Yuan Time: Discussion from the Narrative of Marco Polo ····· Wang Yidan / 67

The Sacrifice of Milk of White Mares at Xanadu accounted by Marco Polo, with Arriving Date of Marco Polo to Xanadu ····· Ma Xiaolin / 84

On Divination in the Urban Economy of Quinsai City: Discussing from Hangzhou Astrologers in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 Zhou Sicheng / 94

An Overlooked Chapter of the Military History in the Yuan Dynasty: A Study of Mongol's *Shaoma* ····· Cao Jincheng / 104

Further Remarks on Some Personal Titles in Marco Polo'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 Luo Wei / 116

Study of the Silk Road

Spices and Maritime Routs between East and West ····· Gao Rongsheng / 131

Manichean-Buddhist Temple in Murtuk: Development of the Silk Road Ruins Database and Deepening of the Re-Identification for Missing Ruins ····· NISHIMURA Yoko, KITAMOTO Asanobu, Zhang Yong / 172

The Silk Road in the 10th Century as Seen from Dunhuang Documents
..... Rong Xinjiang / 190
The Settlements on the South Rim of the Tarim Basin from
the 10th to14th Century ..... Luo Shuai / 206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Independent Regime in Hami
Between Song and Yuan Dynasty: With a Reference to
Marco Polo's Account on Qumul Province ..... Fu Ma / 224
Indian Ocean Trade of the Marco Polo Age ..... Lin Meicun / 233
Maritime Links betwee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Il Khanate
..... Dang Baohai /248
On the Origin of Ancient Hormuz Harbor: Marco Polo and Hormuz
..... Muḥammad Bāqir Vusūqī / 264
A Cultural Biography of Pearls in the Ilkhanate (1260-1335)
..... Matanya Gill / 278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eval China and the Others

Two Topics on Yuan Porcelains ..... Shang Gang / 291
On the "Satru" Magic from the West ..... Meng Sihui / 299
B.sīlā Depicted in *Kūshnāma* and the Ancient East Asian Kingdom of Silla
..... Liu Yingjun / 322
Sino-Iranica in Pax Mongolica: The Elusive Participation of
Syriac-Rite Christians in the Ilkhanid Translation Project
..... ISAHAYA Yoichi / 341
The Rise of Ghazan's Dual Cities: Tabriz & Ghazaniyeh in Documents
..... Chen Su / 363
"Buddhist" and "Daoism" Paintings in Persian Court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14th Century and the 15th Century ..... Yu Yusen / 383

Summ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rco Polo and
the Silk Road (10th-14th Century) ..... Luo Shuai / 405

元代杭州的桥
——从马可·波罗的记述说起

王一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

《马可波罗行纪》中有很大的篇幅描写“蛮子国都行在城”——南宋故都临安（今杭州）的繁华景象，其中关于杭州桥梁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马可·波罗说：“此行在城甚大，周围广有百哩。内有12000石桥，桥甚高，一大舟可行其下。其桥之多，不足为异，盖此城完全建筑于水上，四围有水环之，因此遂建多桥以通往来。”“自大汗（指忽必烈——引者）据有此城以后，于12000桥上，每桥命10人日夜看守，俾叛乱之事不致发生。”[①]马可·波罗两次言及杭州有12000座桥，对此，冯承钧曾指出：“此万数为数之极，犹之‘皇帝万寿’、‘万里长城’等称，盖言其多，未必确有万桥也。”[②]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认为：“杭州城内外有数不清的高桥，但肯定没有马可·波罗所说的10000座那么多，估计他可能将那些模样酷似桥梁的牌楼也计算在内了……不仅在杭州，整个浙江省内都有无数的桥梁和牌楼，如果都算在一起的话，马可·波罗所说的那个令人惊讶的数字，还有可能增加。”[③]当代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指出，在马可·波罗之后，另一位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鄂多立克也记载行在城有12000座桥，一部在欧洲流传颇广的游记体文学著作《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也说到行在城有12000多座

---

① 《马可波罗行纪》，A. J. H. Charignon注，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5章，第525—526页。

② 同上书，第530页。冯承钧在译注中提到了鄂多立克也说行在城有“万余桥”。鄂多立克的描写，参见《鄂多立克东游录》，与《海屯行纪》《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合刊本，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3页。

③ 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浙江省”，转引自党宝海《行在城：从马可·波罗到哥伦布、卫匡国》，杭州文史研究会编《杭州文史》第2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桥，而元朝末年来访的教皇使节马黎诺里则记载行在有10000座雅致的石桥，不论是10000还是12000，都是对行在城桥梁众多的一种夸张的表达，不必拘泥于对具体数字的考订。[①]

尽管可以认定马可·波罗的描述是一种夸大，不过我们仍不免好奇：在马可·波罗的时代，杭州的桥到底多到什么程度，令他做出如此夸大的描述呢？对于这一问题，慕阿德（A. C. Moule，1873—1957）曾在《马可波罗对行在的描述》一文中进行过讨论，[②]不过他的论文的关注点不只局限于桥梁，而涉及杭州城各方面的情况，因此有关桥梁的讨论尚不充分，留下可以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依据宋元以来的汉语文献，以及相关的波斯语史料，对元代杭州桥梁情况作更深入的探讨。

二

在历代杭州方志中，有关桥梁的记述始终是一项重要内容。现存最早的杭州志书"临安三志"中，周淙撰于乾道五年（1169）的《乾道临安志》今存三卷，其中就有"桥梁"条，记录了当时临安73座桥的名称。[③]这大概是杭州现存最早的桥梁名录。这些桥梁几乎都位于临安城墙之内，南起自都亭驿桥，大致自南向北排列，集中在朝天门与御道沿线东西两侧。不过这份名录似有所遗漏，实际桥梁数目不止73座，卷一在记述杭州的寺庙宫观时，提到绍兴三年（1133）"于临安府踏道桥东立庙"，[④]所记"踏道桥"之名未见载于"桥梁"条下。

1252年施谔纂修的《淳祐临安志》今存卷五至卷十，卷七按水系和方位记录了城内大河、小河、西河、城南左厢、城北右厢5个系统，据所列桥梁名称，计得城内大河23桥，小河31桥，西河46桥，城南左厢52桥，城北右厢53桥，共205桥，[⑤]比《乾道志》增加了132座。桥梁所属河道的具体划分是：城

---

① 党宝海《行在城：从马可·波罗到哥伦布、卫匡国》，第6页及第11页注3。

② A. C. Moule, "Marco Polo's Description of Quinsai,"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33-2, 1937, pp. 105-128. 慕阿德此文的信息，承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马可·波罗研究项目成员包晓悦同学提供，特此致谢。

③ （宋）周淙纂修《乾道临安志》卷二《桥梁》，《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据清光绪七年《武林掌故丛编》本影印，第3229页上、下栏。慕阿德认为杭州桥梁在1170年有71座，数字略有出入，见A. C. Moule, "Marco Polo's Description of Quinsai," p. 118, note 1。

④ （宋）周淙纂修《乾道临安志》卷一《行在所·宫观·旌忠观》，《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217页上栏。

⑤ 见（宋）施谔纂修《淳祐临安志》卷七《城府·桥梁》，《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282页上栏—3287页下栏。

内大河“南自都亭驿，直至天宗水门”，相当于卷十所记《城内四河》中的“盐桥运河”（今中河）；小河“自葛公桥入清冷桥，至众安桥、观桥转”，相当于卷十《城内四河》中的“市河（俗呼小河）”（今不存）；西河“中系清湖，南自旱河头直北，至众安桥止；三桥转西入金文桥，至州前断河头止；八字桥转西入清湖桥，直至北关水门止”，相当于卷十《城内四河》中的“清湖河”（今不存）——以上3河在城墙之内。城墙外的桥道分两部分：城南左厢，指东、南城墙外与钱塘江之间的城郊，相当于卷十《城外诸河》中的运河（俗称贴沙河，一名里沙河）、外沙河、菜市河与龙山河诸水道；城北右厢，指西、北城墙外的城郊以及西湖周边地带，包括卷十《城外诸河》中的下塘河、城外运河、下湖河、前沙河等诸水道。[①]《淳祐志》在桥名后常注明其具体位置或旧称，反映了某些地名的历史变迁，如“六部桥，旧称都亭驿桥”，[②]由此可知原《乾道志》中的都亭驿桥，此时已改名为六部桥。都亭驿桥得名于桥东的都亭驿。南宋都亭驿是接待北方使节的馆舍，“在候潮门里”，[③]内设负责宋金之间交聘往来的国信所，1159年金朝使臣施宜生出使临安，作有《题都亭驿》诗，[④]即咏此地。至施谔纂修《淳祐志》时，金朝早已灭亡，都亭驿基本失去作用，桥名便被附近重要的中央机构“六部”所取代。

“临安三志”中距马可·波罗在华时间（1275—1291）最近的一部，是南宋末年的《咸淳临安志》。据书中出现的最晚纪年为咸淳九年（1273）来看，[⑤]其完成时间当略晚于1273年。《咸淳志》是三志中保存最为完整、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撰修者潜说友（1216—1288）时任临安知府，其为人虽颇受诟病，但“其书则颇有条理，前十五卷为行在所录，记宫禁曹司之事，自十六卷以下，乃为府志，区画明晰，体例井然，可为都城纪载之法……缕析条分，可资考

---

① 参见《淳祐临安志》卷七《城府·桥梁》，《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282页上栏—3287页下栏；卷一〇《山川·城内四河》及《城外诸河》，第3325页下栏—3329页下栏。清冷桥，《乾道志·桥梁》作清泠桥。

② 《淳祐临安志》卷七《城府·桥梁》，《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282页上栏。

③ 《乾道临安志》卷一《馆驿》，第3219页下栏。《梦粱录》亦载：“都亭驿在候潮门里泥路西侍从宅侧，次为馆伴，外国使人之地也。”见（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〇《馆驿》，《丛书集成初编》（据《学津讨原》本排印），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年（据1939年初版补印），第83—84页。

④ 《全金诗》卷七《题都亭驿》：“江梅的皪未全开，老倦无心上将台。人在江南望江北，断鸿声里送潮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宋）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四九《秩官七》，《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据清道光十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影印，第3790页下栏：“〔咸淳〕九年癸酉。”关于《咸淳志》具体成书时间的讨论，参见曾洁《〈梦粱录〉与咸淳〈临安志〉》，《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5期，第57页；姜青青《〈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7—18页。

据”,[1]为后代史家所称道。《咸淳志》卷二一《疆域六·桥道》,沿《淳祐志》旧例,将桥道分为大河、小河、西河、城南左厢、城北右厢5个系统。据所列桥梁名称,计得大河31桥,小河32桥,西河54桥,属城内;城南左厢111桥,城北右厢119桥,属城外,城内外桥梁共347座。[2]与《淳祐志》相比,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桥梁增加了142座。作者自述曰:“以上诸桥,咸淳四年(1268)九月安抚潜说友奉朝旨修治,乃遣僚相视,撤旧更新者太半,余则随其阙坏。一切整葺,庳者增崇,狭者增辟,舟车往来,始无前日俾仄阻碍之患,工浩事殷,越明年十月告备。”[3]这是杭州桥梁史上一次重要的修治工程,历时一年多,作者亲主其事,记录的信息当十分准确可靠。

除了文字记录外,《咸淳志》卷一还收录了《皇城图》《京城图》《浙江图》和《西湖图》4幅地图。[4]这些今存最早的杭州地图文献中,记录了众多桥梁名称,可与卷二一《桥道》中的文字记录互相对照。从《京城图》(见图一)可以看到,“大河”在东城墙西侧、朝天门东,从六部桥附近自南向北延伸,至艮山门内转西与北城墙平行,向北出天宗水门;“小河”在御街东、大河西,与大河在朝天门—御街连线东侧互相平行;“西河”则在御街以西,弯曲而有分岔,向北出余杭水门。地图清晰而直观地展现了南宋末年杭州的河道与桥梁分布:纵横交错的大小河道上,桥梁星罗棋布,比比皆是,仅在御街东侧的“小河”河段,就可以看到19座桥,而从御街上的众安桥往西经清湖桥到府治之间的“西河”河段,更是密密麻麻地标示出22座桥。[5]在《西湖图》(见图二)中,从余杭门向北到太平桥之间,也密集地标出了11座桥。[6]事实上,由于地图空间有限,桥名无法一一标出,图上显示的桥梁不及实际数目的一半。仅此已足以看出杭州城内外桥梁的密集程度。在地图上还可发现一些未载于卷二一《桥道》名录中的桥。如《浙江图》(见图三)中,嘉会门外洋泮桥附近有七郎桥、下朱桥二桥,《桥道》名录未载。可见当时有名可查的实际桥梁数应超过347座。

---

①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史部二四·地理类一·咸淳临安志》,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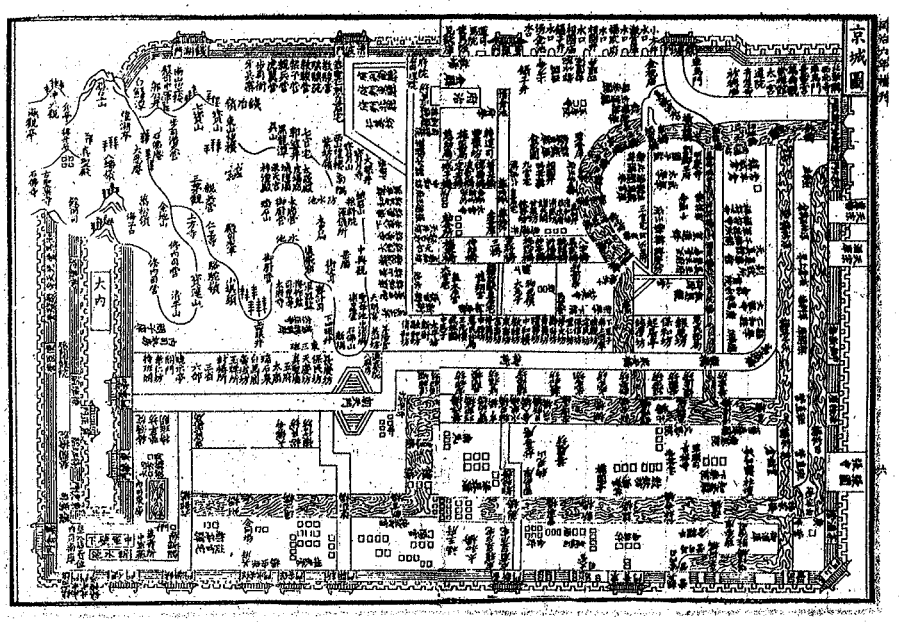
② 参见(宋)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二一《桥道》,《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557页下栏—3566页下栏。慕阿德注意到“347座桥,其中117座位于城中,230座位于郊外”。见A. C. Moule, “Marco Polo's Description of Quinsai,” p. 118, note 1。

③ 《咸淳临安志》卷二一《桥道》,《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566页下栏。

④ 《咸淳临安志》卷一《行在所录·图》,《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354页上栏—3355页下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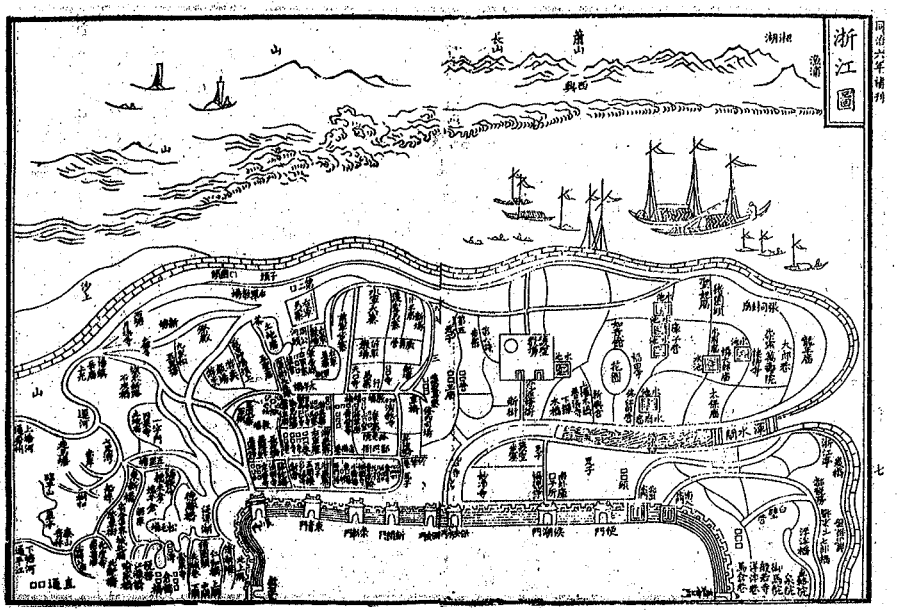
⑤ 今人据宋版《咸淳志》所作复原图上注出的分别为22和25座。参见前引姜青青《〈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第350—352页“京城图”。

⑥ 复原图上标注了12座。参见姜青青《〈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第350—353页“西湖图”。



图一 《咸淳临安志》卷一《京城图》,《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354页下栏

图二 《咸淳临安志》卷一《西湖图》,《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355页下栏



图三 《咸淳临安志》卷一《浙江图》,《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355页上栏

三

如果说记录了1268—1269年桥梁修治工程信息的《咸淳临安志》反映的是南宋末年的状况,不完全等同于马可·波罗的时代,那么,南宋遗民吴自牧所著《梦粱录》则为我们进一步提供了元代的信息。关于此书撰写时间,一般认为是"宋亡后追忆临安盛时"之作。[①]作者所说"甲戌岁中秋日",若指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其时南宋尚在,于理不合,因此有学者认为甲戌为传写之误。[②]卢文弨(1717—1795)《梦粱录跋》指出:"序无纪元而但书甲戌,若在咸淳,则故都尚无恙也,阅一甲子,则当在元顺帝时期。"[③]钱大昕(1728—1804)则认为:"'甲戌岁中秋日',盖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也;若前六十年,则为宋咸淳十年,宋祚未亡,不当有沧桑之感矣。"[④]明确指出其成书时间为1334年,已属元中期。

---

① (清)王士禎《居易录》卷一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七〇《史部二六·地理类三·梦粱录》,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③ (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九《梦粱录跋》,影印清乾隆六十年刻本。

④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梦粱录》,陈文和、孙显军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97页。

《梦粱录》全书20卷，叙述南宋故都临安的城池苑囿，风俗人物，上至郊庙宫殿，下至百工杂戏，无所不备，其中不少内容节录自《咸淳志》，但同时也补充了作者本人的耳闻目睹，透露出许多入元以后的时代信息。如卷七记杭州的桥道，多引《咸淳志》，但又有所不同，将桥道分为大河、小河、西河、小西河、倚郭城南、倚郭城北6个系统，其中"小西河桥道"的划分乃《咸淳志》所无，是将原属西河分支的三桥至流福桥之间的水路单独划为一个河道。[①]对于桥梁的位置及其与附近街衢的关系，《梦粱录》往往交代得更细致。例如，属小河桥道、位于御街上的众安桥和观桥，是南宋皇帝车驾前往景灵宫祭祖的必经之路，位置重要，作者特别加以说明："众安与观桥皆平坦，与御街同，盖四孟车驾经由此两桥，转西礼部贡院路，一直过新庄桥，诣景灵宫，行孟飨礼也。"[②]

据《梦粱录》所记桥梁名称，计得大河32桥，小河33桥，西河35桥，小西河19桥，倚郭城南108桥，倚郭城北122桥，共349桥。[③]《梦粱录》比《咸淳志》桥梁总数略多，有的是因为对桥名的理解与《咸淳志》不同，如《咸淳志》记大河桥道上的通济桥北有"田家普济桥"，《梦粱录》则记载"通济桥北曰田家桥，次曰普济桥"，明确分作两桥；有的是因为对别名的理解不同，如《咸淳志》记西河桥道有"下瓦后桥，又名众乐桥"，认为两者指同一座桥，《梦粱录》的记载是"自众安桥转西曰众乐桥，次曰下瓦子桥"，视为两桥。两书除在桥梁总数上略有出入外，桥名也有不同，如《梦粱录》所记"城北右厢"的咸淳桥、古塘桥、康家桥等不见于《咸淳志》，而《咸淳志》所记五圣庙桥、大慈桥、崇宁桥、翁塔桥等也不见于《梦粱录》，互有异同。

相对于《咸淳志》，《梦粱录》对两座桥梁信息的记载值得格外关注。一是"州桥"。《咸淳志》原已记有一州桥，在"玉牒所对巷"，属大河桥道；《梦粱录》同样记录了这一州桥，但此外还记录了另一座位于临安府治前、属小西河桥道的州桥："临安府治前曰州桥，俗名懊来桥，盖囚到讼庭者，到此心已悔也，故以此名呼之。"[④]《咸淳志》未见此记载，所记西河有一"府衙前桥"，位于流福桥（原名闸儿桥）旁，[⑤]与《梦粱录》所记"州桥"位置相同，似为同一桥。此桥后来又称宣化桥，《西湖游览志》载："杭州府前为宣化桥……宋时

---

①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七《小西河桥道》，《丛书集成初编》（据《学津讨原》本排印），上海：商务印书馆，1960年（据1939年初版补印），第54页。

②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七《小河桥道》，《丛书集成初编》版，第53页。

③ 参见（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七，《丛书集成初编》版，第52—57页。《梦粱录》流传版本较多，各版本标点、断句不同，导致对桥梁数的统计也存在一定出入，所得总数介于347—352之间。

④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七《小西河桥道》，《丛书集成初编》版，第54页。

⑤ （宋）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二一《桥道》，《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559页下栏。

俗称懊来桥，至今仍之，谓好讼者与作恶而被刑者，至此皆有悔心也。”[①]《(乾隆)杭州府志》还记录了宣化桥的另一个旧称：“在府治前，旧名净因桥，又名州桥，俗名懊来。”[②]“净因桥”，《乾道志》中有载，称“净因寺桥”，[③]得名于桥旁原有之净因寺。宋室南渡后以凤凰山之西的原临安府治为行宫，府治另行迁至清波门北的净因寺故基，[④]桥名因此改为州桥。总之，临安府治前的这座桥，因朝代更迭而多次更名，但其俗称“懊来桥”却一直行用，流传最广，不但见于方志文献，诗歌也多有提及。宋曹勋(1098—1174)《道过京师》诗云：“败壁断垣成怅望，一鞭又过懊来桥。”[⑤]清俞樾(1821—1907)《茶香室丛钞》卷一二记“懊来桥”，曰：“此名极有意义，余在杭时见有人以细故将成讼者，赋诗晓之曰：‘好从且看楼头看，莫向懊来桥上来。’”[⑥]临安府治所历元、明、清三代未变，至民国时被废，考古调查表明，其故址在今河坊街北、南山路东及劳动路西一带，而州桥(懊来桥)则在今旧仁和署巷南端与河坊街交界处。[⑦]

二是“聚景桥”。聚景桥之名仅见于《梦粱录》，不见于其他志书。此桥属“倚郭城北桥道”，在“聚景园前”，[⑧]当因聚景园而得名。聚景园曾是临安最大的御苑，南宋诸帝“幸聚景园”之事在《宋史》中记载很多，尤以孝宗时为盛，[⑨]当时文人描述过孝宗、高宗率群臣在聚景园游乐时“都人倾城，尽出观瞻”的盛况。[⑩]关于这座著名的皇家苑囿，《咸淳志·苑囿》有详细介绍：“聚景园，在清波门外，孝宗皇帝致养，北宫拓圃西湖之东，又斥浮屠之庐九以附益之。清波门外为南门，涌金门外为北门，流福坊水口为水门。亭宇皆孝宗皇帝御扁，尝恭请两宫临幸，光宗皇帝奉三宫，宁宗皇帝奉成肃皇太后亦皆同

---

①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三《南山分脉城内胜迹·衢巷河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60页。

② (清)郑沄修，邵晋涵纂《(乾隆)杭州府志》卷六《桥梁》，叶1a，清乾隆刻本。

③ (宋)周淙纂修《乾道临安志》卷二《桥梁》，《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229页下栏。《梦粱录》卷一二《城内外河》仍提到“府治前净因寺桥”，说明净因寺桥之称在南宋之后仍行用。

④ 《乾道临安志》卷二《廨舍》：“府治，旧在凤皇山之右……建炎四年，翠华驻跸，今徙治清波门之北，以奉国尼寺即净因寺故基创建。”(《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224页上栏)

⑤ (宋)曹勋《松隐集》卷一七《道过京师》之二，民国嘉业堂丛书本。

⑥ (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卷一二《懊来桥》，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书本。

⑦ 参见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4页。

⑧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七《倚郭城北桥道》，《丛书集成初编》版，第56页。

⑨ 参见《宋史》卷三四《孝宗纪二》、卷三五《孝宗纪三》、卷三六《光宗纪》、卷三七《宁宗纪一》、卷三八《宁宗纪二》等多处。

⑩ (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钱之江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2—163页。

幸。岁久芜圮,今老屋仅存者……有桥曰柳浪,曰学士,皆粗见大概,惟夹径老松益婆娑。"[①]聚景园在理宗后渐被冷落。《咸淳志》此处提到的柳浪、学士二桥,未见于卷二一的桥道名录中,可能即因聚景园此时早已颓败,园中小桥无人踏足,不在修治之列,故未被记录。至于《咸淳志》没有提到聚景桥的原因,可能因为这座桥是后来新建的。这一点下文还将述及。

除《梦粱录》之外,另一位南宋遗民周密(1232—1298)所著《武林旧事》一书,也留下了许多与桥梁有关的记载。《武林旧事》完成于1290年前后,与马可·波罗在华时间最为接近,书中虽未列专门记录桥梁的章节,但所记故事涉及桥梁甚多,颇有不见于《咸淳志》《梦粱录》二书者,如卷五《湖山胜概》记西湖三堤路之小新堤有"马蝗桥"、北山路有"黄山桥"、葛岭路有"龙脊桥"、上天竺灵感观音院有"崇老桥""金佛桥",卷一〇《约斋桂隐百课》记南湖有"御风桥"、北园有"揽月桥""飞雪桥"、众妙峰山有"水湍桥"等;[②]卷七《乾淳奉亲》更是描述德寿宫中有座"万岁桥","长六丈余,并用吴璘进到玉石甃成,四畔雕镂阑槛,莹澈可爱,桥中心作四面亭,用新罗白罗木盖造,极为雅洁"。[③]以上诸桥名称似均不见载于他书。综合此书与《咸淳志》《梦粱录》所载,可知元代杭州有名字记录的桥梁数应多达360座以上。[④]至于没有名字的其他小桥、便桥则更多,当远在此数之上。

四

在杭州的众多桥梁中,有一座以"回回"命名的桥,即"回回新桥"。元代杭州方志无存,"回回新桥"之称,最早见于明代方志。成书于1475年的《(成化)杭州府志》记录杭州城内外桥梁共计468座(城内大河24,小河25,西河50,东运河27,城外仁和县237,城外钱塘县105),[⑤]与《咸淳志》和《梦粱录》相比,增加了100多座,其中提到"积善桥,旧有回回拜佛堂,俗呼回回新桥"。[⑥]

---

① 《咸淳临安志》卷一三《苑囿》,《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490页下栏—3491页上栏。《梦粱录》及《武林旧事》也有类似记述,参见(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园囿》,《丛书集成初编》版,第176页;(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四《故都宫阙·御园》,第67—68页。

② (宋)周密《武林旧事》,第99、103、104、106、117、124、215—216页。

③ (宋)周密《武林旧事》,第166页。作者在其另一部著作中称此桥"乃中秋赏月之所",见《癸辛杂识》别集下《德寿赏月》,王根林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

④ 当代杭州桥梁研究者指出:"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咸淳《临安志》等文献记载,此时临安城内外有名可查的桥梁就有上千座之多。"不过书中列举桥梁数亦仅三百多座。参见赵怡、冯倩、项隆元编著《杭州运河桥梁》,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年,第13—15页。

⑤ (明)陈让修,夏时正纂《(成化)杭州府志》卷四《封畛·桥梁》,叶1a—18b,明成化十一年刻本。

⑥ 《(成化)杭州府志》卷四《封畛·桥梁·城内》,叶2b,明成化十一年刻本。

此桥的位置在城内大河(盐桥河)上,与清泰桥(荐桥)和丰乐桥相邻。成书于1579年的《(万历)杭州府志》有关记述相同。[①]

"回回新桥"一称也出现在明代笔记中。郎瑛(1487—1566)《七修类稿》中记载了明武宗时回回新桥邓副使家灶下柴堆忽放光芒的异事。[②]田汝成(1503—1557)《西湖游览志》则提到:"忠孝巷,俗称中沙巷,北通回回新桥,舟行上河者舣此。"[③]忠孝巷(中沙巷)在丰乐桥、荐桥附近,北边有回回新桥,是大河上往来舟船的停靠之所。

清代志书中也不乏关于回回新桥的记录。《(康熙)钱塘县志》记积善桥"旧有西域拜佛堂,俗呼回回新桥",又说柴木巷、忠孝巷等"在回回新桥西北"。[④]西域拜佛堂之称,指明回回人来自西域;而以回回新桥指示方位,表明它已是这一带坐标性的建筑。《(乾隆)杭州府志》还提到了积善桥在宋代志书中的旧称:"《乾道志》作道明桥,俗呼回回新桥。"[⑤]在《乾道志》所记73座桥梁中,道明桥名列第11,与荐桥、丰乐桥相邻。《咸淳志》桥梁名录及附图中未载道明桥,但在记载杭州诸井时提到,荐桥和丰乐桥附近有"双井,在道明桥东",[⑥]可见此桥在南宋末年仍称道明桥。

由上可知,道明桥与荐桥、丰乐桥一样,是杭州见诸文献记载的古老桥梁之一,明代称为积善桥,但广为人知的是其俗称回回新桥。回回新桥之称,无疑缘于桥畔的"回回拜佛堂"。所谓回回,指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即来自西域的穆斯林。[⑦]回回拜佛堂(或西域拜佛堂),则是穆斯林做礼拜的场所,今一般称为清真寺。元代大量西域穆斯林来到中国,故有"元时回回遍天下"的说法。[⑧]杭州作为南宋故都,其繁华富庶对西域穆斯林尤具吸引力,周密《癸辛杂识》云:"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⑨]反映的就是众多来华穆斯林在杭州等江南名都择地而居的状况。穆斯林群体聚居之地,需要有举行集体礼拜(聚礼)的场所。回回新桥附近的清真寺,应当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此寺具体建于何

---

① (明)刘伯缙修,陈善纂《(万历)杭州府志》卷四五《桥梁》,叶1b,明万历刻本。

②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八《奇谑类·柴光》,明刻本。

③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四《南山分脉城内胜迹·衢巷河桥》,第172页。

④ (清)魏嵘修,裘琏纂《(康熙)钱塘县志》卷三《城濠·河梁》及《城濠·里市》,叶27b、11a,清康熙刊本。

⑤ (清)郑沄修,邵晋涵纂《(乾隆)杭州府志》卷六《桥梁》,叶2b,清乾隆刻本。

⑥ 《咸淳临安志》卷三七《山川一六·井》,《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688页上栏。

⑦ 参见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原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此处引自《元史三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5页。

⑧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598页。

⑨ (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沙碛》,王根林校点,第76页。

时，史书未见记载。不过，距此不远处的另外一座著名的清真寺——凤凰寺，留下了相对较多的记述，可为我们提供参照。

凤凰寺原称礼拜寺、真教寺，是中国东南四大清真古寺之一，位于今杭州西湖大道南、御街西、后市街东，这一带在元代属文锦坊，是商贸繁荣的中心地带。“礼拜寺，在西文锦坊南，元回回大师叫佛之所。”[①]“自清河坊而北，至文锦坊。”[②]“文锦坊，西通三桥街者，俗称洋坝头（今称羊坝头）。”[③]关于凤凰寺的建立时间，存在多种说法。《西湖游览志》指明其建于元中期：“真教寺，在文锦坊南。元延祐（1314—1320）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俗称礼拜寺。”[④]立于明弘治六年（1493）的《杭郡重修礼拜寺记》则认为它建于元代初期：“杭郡礼拜寺……创于前元世祖至元辛巳（1281）。”[⑤]清顺治五年（1648）《重修真教寺记》又云：“武林真教寺创自唐代，历宋而元而明……”[⑥]将其创建时间追溯到唐代。尽管说法不一，但可确定的是，凤凰寺在元代经历过一次重要的建设，即使不是完全新建，至少也是在一块已成废墟的遗址上重建了一座新的清真寺。[⑦]由于穆斯林人数众多，元代杭州城中有不止一座清真寺。这一时期的波斯伊利汗国史学家拉施特（Rashīd al-Dīn Hamadānī，1247—1318）在所著《史集·中国史》中说：“〔行在城〕有3个极为雄伟的大清真寺，每逢礼拜五都挤满了穆斯林。”[⑧]元晚期来到中国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ṭṭūṭa, 1304—1377）的游记中说杭州城里穆斯林很多，有清真寺和宣礼员，其中有座清真寺是由一位名叫欧斯曼的埃及富商修建的。[⑨]由此推测，积善桥附近的回回拜佛堂的建立时间，应与此大致相仿，即在元代大批穆斯林移居杭州时期，[⑩]而“回回新桥”这一称呼的出现，当也在回回拜佛堂兴建后不久。考虑到《梦粱录》《武林旧事》等著作均未提及回回拜佛堂和回回新桥，其出现时间当在两书完成之后，即元代中后期。由于穆

---

① （明）陈让修，夏时正纂《（成化）杭州府志》卷四七《寺观一·城内》，明成化十一年刻本。

②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三《南山分脉城内胜迹·衢巷河桥》，第154页。

③ 同上书，第156页。

④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八《南山分脉城内胜迹·佛刹》，第205页。

⑤ 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49页。

⑥ 同上书，第52页。凤凰寺共有5方中文寺碑，除已引的2方之外，另3方碑文见同上书第53—57、第61—62页。

⑦ 参见〔英〕乔治·兰恩《关于元代的杭州凤凰寺》，姚大力、刘迎胜主编《清华元史》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4—166页。

⑧ 王一丹《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

⑨ 〔摩洛哥〕伊本·白图泰著，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第551—552页。

⑩ 离杭州不远的上虞县也曾有过一个“回回拜佛堂”，建于元末。参见《（光绪）上虞县志》卷二五上《舆地志·古迹》，叶14a，清光绪十七年刊本。

斯林人口大量涌入杭州，当地人与穆斯林接触渐多，这一时期的笔记著作中留下了不少有关穆斯林风俗的记述。周密的《癸辛杂识》记载了回回妇人以凤仙花染甲、回回人送终、回回国道路艰难、回回历无闰月等习俗。[①]陶宗仪(1329—1412)在《南村辍耕录》中则记述了回回人结婚时的礼仪，以及有关回回外貌和名字的打油诗。[②]两书都提到了元代穆斯林在杭州的聚居地，《癸辛杂识》云："辛卯岁(1291)……火作于天井巷回回大师家，行省开元宫尽在煨烬中。"[③]回回大师(清真寺掌教阿訇)家所在的天井巷，"在清河坊北首一带"，[④]是临安城中心区域，南宋秘书省和循王府均位于此地，"宋诸王子孙居之者如蜂房"。[⑤]入元后，循王府被改为"江浙省官署"，即周密所说的"行省"。周密的记述表明，元初有回回大师在清河坊一带与江浙行省比邻而居，此处距凤凰寺、羊坝头不远，是一处穆斯林集中居住的地带。《南村辍耕录》则记载："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⑥]荐桥，如前所述，在大河(盐桥河)上，荐桥西侧有南宋回易库和都税务，回回富商择居于此，便于办理商贸事务。荐桥北为回回新桥，再北为丰乐桥，据载，丰乐桥东也有回回官员居住。元初曾任上海等县达鲁花赤，后"再调杭之税司提举，又再调常州宜兴同知"等职的回回人舍剌甫丁，致仕后便"隐居于杭之丰乐桥东旧班前……没于癸亥岁(1323)"。[⑦]荐桥、回回新桥、丰乐桥是大河上紧邻的三座桥，这一带成为穆斯林聚居地后，建起一座"回回拜佛堂"，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回回拜佛堂的建立，同凤凰寺一样，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元代杭州多民族、多宗教的多元文化特色，回回新桥之称，则是这种多元文化留下的时代烙印。回回新桥至今仍在，位于今中河丰乐桥与荐桥之间，是一座长17米，宽3.1米的东西向拱形石桥，西接中河中路，通缸儿巷、积善坊巷，东连民权路、丰家兜，这一带至今仍是回族聚居区。[⑧]

---

① (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金凤染甲》《回回送终》《回回沙磧》，别集上《回回无闰月》，王根林校点，第73、78—79、76、145页。

②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八《嘲回回》，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2004年重印版)，第348页。

③ (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海鳅兆火》，第87页。

④ 吴自牧《梦粱录》卷七《杭州·禁城九厢坊巷》，《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8页。

⑤ 郑元祐《古墙行并序》，(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庚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837页。

⑥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第348页。

⑦ (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卷一八附补遗一卷，道光四年广东刊本，《历代碑志丛书》第1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又见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第446页，《元舍剌甫丁墓碣》。

⑧ 参见杭州市建设委员会、杭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编《中东河桥梁博物馆》，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34—37页；李松茂主编《回族 东乡族 土族 撒拉族 保安族百科全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525页。

除了清真寺，聚景园的变迁也体现了元代杭州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聚景园在南宋后期日渐荒废，到元代时，已演变成穆斯林的公共墓园。元尹廷高《柳浪闻莺》诗题注云："柳浪闻莺，在聚景园，今为回回坟。"[①]尹廷高生卒年不详，属元前期诗人，他的题注表明聚景园在元初已经成为了穆斯林墓园。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嘲回回》中说："聚景园，回回丛冢在焉。"[②]周密《癸辛杂识·回回送终》则更详细描述道："回回之俗，凡死者……其棺即日便出瘗之聚景园，园亦回回主之。凡赁地有常价，所用砖灰匠者，园主皆有之，特以钞市之……辛卯春(1291)，于瞰碧目击其事。"[③]辛卯春，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八年，周密的记述表明，蒙古人占领临安后才15年，昔日的南宋皇家御苑，已经变成了来自异国他乡的西域穆斯林的长眠之地。[④]

前文说到聚景园中原有柳浪、学士二桥，园前则有聚景桥。聚景桥一名，除《梦粱录》之外，不见于其他文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三《南山胜迹》记聚景园中有"柳浪、学士等桥……今惟柳桥尚存，世称柳浪闻莺者是也"，[⑤]说明当时聚景园中的学士桥已不存，柳浪桥仍在；但同卷又说聚景园前有一座学士桥："学士桥，当故宋聚景园前，盖城中铁冶岭诸山之水旧出钱湖门，输委于西湖者，必经桥下，大小歧派，若夹字然，故称夹字港。港长九十六丈，后人讹为学士港。然则学士桥者，岂即夹字桥之误欤？而宋时《咸淳志》《梦粱录》诸书，皆无夹字桥之名，独《武林旧事》有学士、柳浪等桥，而柳浪闻莺遂为西湖十景之一，盖不可谓无据也，岂其时有文人为学士者，得宠昵于从游、应制、题咏，遂以名桥……桥久崩废，惟条石丈余，横跨港口，舟人以小艇入舣清波门者，佝偻乃度。郡人王翰者，好义士也，捐资重建之，高广倍昔，题其梁曰学士桥，盖从郡人称名之便，且疑以传疑，存旧迹也。汝成为之记，立石建亭于桥畔。"[⑥]显然明代学士桥已不在园中，而移到聚景园前。研究者认为这一重建的学士桥即原先之聚景桥："南宋时，城中铁冶岭诸山之水出钱湖门，流入西湖，必经聚景桥下，大小歧呈'夹'字形，故称夹字港。港长九十六丈，后人讹为学士港。后桥久废。至明时，郡人王翰捐资重

---

① (元)尹廷高《玉井樵唱》卷上《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西湖十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第348页。

③ (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送终》，王根林校点，第78—79页。

④ 今存于凤凰寺的穆斯林碑铭，最早纪年为1307年，属元代。参见莫尔顿(A. H. Morton)释读、英译，周思成校注、中译，乌苏吉(Vosoughi)释读校《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16页，第1号墓碑；另参见刘迎胜为此书所撰序言：《时代的见证——〈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注〉序》，第4页。

⑤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三《南山胜迹》，第28页。

⑥ 同上书，第27页。

建，题桥名曰学士桥。”[①]今西湖南山路学士公园前，仍有一学士桥，乃水泥铺砌小桥，可过汽车。[②]

五

作为南宋王朝的首都，杭州的美丽富饶名闻天下，马可·波罗时代的波斯语文献对此多有记载。如前所述，伊朗伊利汗国史学家拉施特在所著《史集·中国史》中记录了杭州有3座清真寺的信息，他在另一部有关农学的著作《迹象与生命》(*Āṯār va Aḥyā*)中有关杭州出产杨梅的记载也非常准确。[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伊利汗国另一位史学家瓦萨夫(Vaṣṣāf al-Ḥaẓrat，原名 Shihāb al-Dīn ʻAbd Allāh Sharaf Shīrāzī, 1264—1334)的一条记载。他在以《瓦萨夫史》(*Tārīkh-i Vaṣṣāf*，作于1312—1328年)闻名的著作中留下大段关于杭州的描写，其中提到：“行在(Khanzāy)是中国(Chīn)的一座大都市……城中建有360座桥，位于诸多像底格里斯河(Dijla)一样水量充沛的河流之上，河流分支众多，注入中国海(Daryā-yi Chīn)。”[④]瓦萨夫所记360座桥梁的数目，与《梦粱录》接近，十分值得注意。《瓦萨夫史》有关杭州的另外一个记述也颇为准确：“〔行在〕有4万户(chahār tūmān)军负责驻守戍卫。”[⑤]这一数字与《元史》所载杭州“置四万户府”的情形是相符的。[⑥]

除了拉施特和瓦萨夫之外，伊利汗王朝晚期的史学家哈姆杜拉·穆斯图菲(Ḥamd 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 1281—1351)在《心之喜悦》(*Nuzhat al-Qulūb*，成书于1340)一书中，也两次记述了杭州的信息。他提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与中国的行在(Khansāy)、汗八里(Khān Balīgh)等城市之间的距离：

---

① 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年，第273页。

② 本节有关回回新桥、学士桥现状的信息，承浙江图书馆吴志坚老师惠告，谨致谢忱。

③ Rashīd al-Dīn, *Āṯār va Aḥyā*(《迹象与生命》), eds. M. Sutūda and I. Afshār, Tehran: Mc Gill University-Tehra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00. 相关的研究，见陈春晓《杭州与杨梅——从一条波斯文史料谈起》，杭州文史研究会编《杭州文史》2015年第2辑，第28—32页。

④ Faẕl Allāh b. ʻAbd Allāh Shīrāzī Vaṣṣāf al-Ḥaẓrat, *Tārīkh-i Vaṣṣāf*(《瓦萨夫史》), Tehran: Ibn-i Sīnā, 1959, p. 21. 德译本见 *Geschichte Wassaf's*, Persisch Herausgegeben und Deutsch Übersetzt von Hammer-Purgstall,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0, Band 1, Deutscher Text, S.42-43; Persischer Text, S.42- 44。慕阿德前引文中也提到了瓦萨夫的记载，不过所引数字为340座，见 A. C. Moule, “Marco Polo's Description of Quinsai,” p. 118。

⑤ Vaṣṣāf al-Ḥaẓrat, *Tārīkh-i Vaṣṣāf*(《瓦萨夫史》), p. 21.

⑥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册，第341页。参见刘晓《元镇守杭州“四万户”新考》，《浙江学刊》2014年第4期，第36—44页。

〔麦加〕至摩秦(Māchīn,南部中国)的都城行在(Khansāy),距离为52度(daraja),即1300法尔生格(farsang)……至乞台(Khitāy,北部中国)的都城汗八里(Khān Balīgh),距离为46度,即1150法尔生格。[①]

这里所说的"度","是依据经度和纬度对某个地点进行天文学上的距离推算,大多数天文历表(zījāt)上都有此类标注,是一种理论上的空间距离,按托勒密(Ptulīmūs)的说法,1度相当于25法尔生格"。[②]如此,上述52度等于1300法尔生格,46度等于1150法尔生格,而1法尔生格等于6.24公里。据此推算,《心之喜悦》所记麦加至行在(杭州)的距离为8320公里,至汗八里(北京)为7360公里。我们今天根据Wolfram Alpha数据可知,杭州到麦加的距离是7953公里,北京到麦加的距离是7396公里,《心之喜悦》的记述虽不算精确,但已很接近。

《心之喜悦》在讲述东方各国时,再次介绍了南部中国及其都城行在的情况:

摩秦(Māchīn),蒙古人(Mughūl)称之南家思(Nankiyās),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属第一、第二气候带(aqālīn-i avval va duyum),首都行在城(shahr-i Khansāy),有人称之为Siyāhān (?)[③],在大地可居住区域(rub'-i maskūn)内没有哪个城市比它更大了,它是东方境域最大的国家。城市中间有个湖(buḥayra),周回6法尔生格,它的周围全是都市屋宇楼台……那里的人多为异教徒(kāfir),穆斯林(musalmānān)人数虽

---

① Ḥamd 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 *Nuzhat al-Qulūb* (《心之喜悦》), ed. M. Dabīr Siyāqī, Qazvīn: Nashr-i Ḥadīṯ-i Imrūz, 2002, p. 47. 亦可参阅斯特兰奇的波斯文校勘本:*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Qulūb Composed by Ḥamd-Allāh Mustawfī of Qazwīn*, ed. G. le Strange, Leyden: E. J. Brill/London: Luzac, 1913, p. 10。英译本见:Ḥamd Allāh Mustawfī of Qazwīn,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Qulūb*, trans. G. le. Strange, Leyden: E. J. Brill/London: Luzac & Co., 1919, p. 10。《心之喜悦》长期以来只有几种不完整刊本(仅第一卷或第三卷)。本文待刊期间,伊朗首次出版了《心之喜悦》波斯文校勘本全本,本文此处及以下几处引文均可见于这一最新版本。为避免文章校样改动过大,引起排版不便,本文不一一补注新版本页码出处。其出版信息为:Ḥamd 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 *Nuzhat al-Qulūb (matn-i kāmil)* (《心之喜悦(全本)》), ed. Mīr Hāshim Muḥaddiṯ, Tehran: Intishārāt-i Safīr Ardihāl, 2017, 2 volumes。

② Ḥamd Allāh Mustawfī Qazvīnī, *Nuzhat al-Qulūb* (《心之喜悦》), ed. M. Dabīr Siyāqī, p.46. 斯特兰奇波斯文校勘本:*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Qulūb Composed by Ḥamd-Allāh Mustawfī of Qazwīn*, ed. G. le Strange, p. 10。英译本见:Ḥamd Allāh Mustawfī of Qazwīn,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Qulūb*, trans. G. le. Strange, p. 10。

③ Siyāhān,斯特兰奇推测这可能是汉语"西湖(Xihu)"一词发音的讹变。参见Ḥamd Allāh Mustawfī of Qazwīn,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Qulūb*, trans. G. Le. Strange, p. 254, note 3。

少，却更有势力。[①]

穆斯图菲描述西湖在城市中间。有趣的是，马可·波罗也说“城中有一大湖”。[②]为什么西湖给人位于城市之中的印象呢？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解释是：“其时绕湖皆巷市，民居与百司寺观，错杂而处，看《咸淳临安志》西湖图可见其概。陆游诗‘西湖为贾区，山僧多市人’……可见南宋的西湖，一派繁华喧阗，杳然无复山林气象了。”[③]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穆斯图菲说杭州“穆斯林人数虽少，却更有势力”，这是符合元代回回人的实际社会地位的。[④]前文所述，穆斯林在入元不久，就将西湖岸边的聚景园变成了供其支配的公共墓园，由此即可看出当时杭州穆斯林群体的势力之大。

元代中国与伊朗伊利汗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两国之间的使臣、商人、学者和工匠的交往，不论经由陆路还是海路，都空前活跃。马可·波罗是这个空前活跃的文化大交流、大融合时代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密切的交往使信息的快速传播成为可能。拉施特、瓦萨夫和穆斯图菲，三位波斯史学家都没有来过中国，他们的记述却都不乏准确、真实之处，十分引人注意。他们获得信息的途径是什么、他们各自有哪些材料来源，值得我们今后特别关注。

六

南宋是杭州历史上桥梁建设的一个高潮时期，城内外河道纵横，港汊密布，水面上“桥梁之多，在中国古城中当是首屈一指的”。[⑤]宋元交替之际，杭州的城市建设未遭太大破坏，基本上保留了南宋时期的面貌。马可·波罗说杭州桥梁有12000座，对另一个著名的水乡苏州，则说“此城有桥六千”，[⑥]表明杭州桥梁之多给他留下的印象，远在其他城市之上。其实，不仅马可·波

---

① Ḥamd Allāh Mustawfī of Qazwīn *The Geographical Part of the Nuzhat-al-Qulūb Composed by Ḥamd-Allāh Mustawfī of Qazwīn*, ed. G. le Strange, p. 261. 考虑到这段记述目前能供利用的波斯文刊本只有斯特兰奇这一校勘本，刊本中原文字母大都没有识点，不易辨读，为方便读者，特将波斯文转录如下：

ماچین، مغول ننکیاس خوانند، مملکتی طویل و عریض است، از اقالیم اوّل و دویم، و دارالملکش شهر خنسای است و بعضی سیاهان گفته اند که از آن بزرگتر شهر در ربع مسکون نیست و باتفاق در حدّ شرقی بزرگترین بلاد است، و آنرا بحیره در میان شهر است دورش شش فرسنگ باشد، و در حوالیش عمارات شهر است ... و اکثر آن قوم کافر اند امّا با قلّت عدد مسلمانان را قوّت بیشتر باشد.

② 《马可波罗行纪》，A. J. H. Charignon 注，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第526页。

③ 谭其骧《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6页。

④ 参见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元史三论》，第245—282页。

⑤ 前引赵怡、冯倩、项隆元《杭州运河桥梁》，第13、25页。

⑥ 《马可波罗行纪》，A. J. H. Charignon注，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第155章，第522页。

罗这样的异乡游客如此，杭州本地人移居他乡之后，记忆中留下的，也是杭州城河上“有无数的桥梁”这样的印象。[①]由于时代的变迁，杭州古今桥梁的状况已大不相同，但桥梁众多仍是今天这个城市的显著特色，以六部桥和回回新桥所在的中河（宋元时期的大河或盐桥河）为例，在长仅10公里的河道上，就有近40座多姿多彩的大小桥梁。[②]据统计，“目前中河、东河上有50余座桥梁……有些地方桥与桥之间相距不过百米”，[③]可谓“五步一登、十步一跨，触目皆是”。[④]可惜的是，近现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城市中心的一些河道逐渐消失，比如宋元时期位于御街之东、大河之西的小河（市河），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被填河筑路，从此不复存在，[⑤]其南端的一部分变成了今河坊街的一段；[⑥]又如，千百年来连接西湖，横贯市区，风景如画的西河（清湖河，民国时称浣纱河），在20世纪70年代，也因人防工事建设需要，被改建为地下防空通道和合流暗渠，地面大部分地段变成了通衢马路，沿河22座桥梁同时被拆除。[⑦]随着小河、西河的消失，杭州老街巷中已难见到“东西南北步步桥”的景象，我们只能凭借马可·波罗等旅行家的描述以及古籍的记载，来遥想当年那种“池开砚北窗临水，桥近梅东路似村”[⑧]的美好景象了。

---

① 阮毅成《三句不离本杭》，杭州：杭州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② 薛家柱《杭州运河新貌》，《杭州全书·运河（河道）丛书》，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年，第39页。

③ 赵怡、冯倩、项隆元《杭州运河桥梁》，第62页。

④ 陈从周《水乡的桥》，黄昌勇、许锦文编《陈从周散文》，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1页。

⑤ 赵怡、冯倩、项隆元《杭州运河桥梁》，第10页。

⑥ 同上书，第66页。

⑦ 薛家柱《杭州运河新貌》，第34—35、40页。

⑧ （清）钱琦《归田八首·天水桥》，转引自赵怡、冯倩、项隆元《杭州运河桥梁》，第114页；又见蔡云超、俞宸亭等著《杭州河道诗词楹联选粹》，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年，第143页。